

在思想的深流里,寻找人类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无限可能

——生态文学四人谈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,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,中国当代作家开始基于现代文明观念自觉反思生态问题,经过30余年来的创作实践与不断探索,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,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等不同体裁的代表性作品相继涌现。

新时代以来,繁荣生态文学,讲好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故事,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夯实思想基础,已成为文学界的共识。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,作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持续提升,生态文学创作的内容更加丰富、形态更加多样,也更注重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互动关系。本期特邀李青松、刘华杰、沈念、阿霞几位作家、学者和出版人,深入讨论何谓“生态”,如何“文学”,共同思考新时代生态文学的时代价值与文化意义。

——主持人 教鹤然

以生态和自然作为创作和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,您认为,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视为是“生态文学”?“生态文学”的概念要如何界定?

李青松: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。生态文学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抒写对象,这里的关键词是“关系”,不是单方面的“人”,也不是单方面的“自然”。生态文学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,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,强调人的责任与担当。

在生态文学中,自然的事物是主角,就像传统的中国山水画一样,人是站在低处的。然而,并不是作品中写了山水,写了草木以及各种动物和植物,就认定是生态文学。鲁迅写过百草园、枣树和獾,写过很多动植物,屠格涅夫写了《猎人笔记》,但不能把他们认定为生态文学作家,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还看不到自觉的生态意识。因此,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,除了反映“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”之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,即反映“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”。

阿霞: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,自然始终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。生态文学既是当代中国文学最具现实意义的创作题材,也是承载千年文化基因的深厚传统。从古代文人寄情山水的诗词歌赋,到现代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,生态文学始终与人类文明进程同频共振。理想的生态文学应该是一种将自然生态意识、人文关怀与文学审美深度融合的创作形式。它既非单纯的环保宣传文本,也不是对自然景观的浪漫化描摹,而是以文学特有的叙事力量、审美和哲学思辨,探索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,反思现代性语境下的生态危机,并为构建健康的生态伦理提供精神指引。生态文学不止于“唤醒意识”,更试图激发大众对“生态责任”的思考和行动。

沈念:对写作者而言,文体概念的边界或许可以模糊,文本自身的温度和蕴含的生命力才是真正的罗盘。我的一些作品被贴上生态文学的标签,也被提名过国内生态文学奖的评选,但坦白讲,创作之初我并没想到是在写生态文学。我以洞庭湖为背景的书写,记录的是田野经验,抒怀的是生命史,通向的是人心。不如说生态文学的本质,就是“生命的文学”,它像一条奔腾的河流,汇聚着所有关于人与自然、生命与生命之间复杂关系的书写。如果非要界定,无论是题材内容,还是创作手法,这种生态书写是开放、包容的容器,也是流动、生长的生命体。它拒绝僵化的堤坝,拥抱一切真诚的生命回响。

“生态文学”是一种文学题材,还是一种文学类型,或是一种创作方法?“生态文学”与“自然文学”“环境文学”“环保文学”等概念之间的异同在哪里?

阿霞:自然文学侧重个体对荒野的精神体验,如爱默生将自然视为“精神之象征”,更多是情感性抒写;环境文学隐含人类中心主义立场,将自然视为环绕人类的“资源”或“背景”;生态文学则强调生物与环境的互为主体性,要求打破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。生态文学不是题材分类,更不是类型文学,而是一种跨学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论。它要求作家具备生态科学素养与整体性思维,在叙事中构建“生命共同体”的伦理框架。

当下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生态文学需要兼具“科学的严谨”与“人文的温度”。它的基础是生态学、生物学、地理学和环境学,同时,它也必须与伦理学、哲学、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的支撑,让生态文学成为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媒介,并获得文学的主体性存在。

沈念:我更倾向于把生态文学看作一种文学题材,但它的疆域又远比单一题材辽阔,更多体现为独特的生命视角,穿透表象、洞察万物互

联的观察方式。“自然文学”可能偏重自然本身的描摹,“环境文学”常聚焦于具体环境问题的警示,“环保文学”倾向明确的行动呼吁,生态文学则更深邃、更具整体性。它试图揭示生命网络的内在肌理,探讨人类在其中的位置、责任以及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的命运纠缠。生态文学不排斥美,更不回避痛;它书写和谐,也直面冲突;它关乎外部环境,更直指心灵的生态。

李青松:在我看来,生态文学可能既是一种文学题材,也是一种文学类型。一个是“器”里的“物”,一个是装“物”的“器”。对于生态文学而言,“物”和“器”是一个东西。雪在雪里还是雪,冰在冰上还是冰。说它是一种文学题材是指它的书写对象和表达内容;说它是一种文学类型是指它反映的主题,以及作品的立场和对待自然的态度。一般而言,生态文学具有四个特征:第一,自觉的生态意识。作品中的生态意识不是被动的,不是消极的,而是主动的,积极的。第二,生态文学的书写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不是自然本身,也不是人类本身。第三,生态文学强调作者的亲历性,就是作者的在场位置,在场经历,在场认识,在场思考。第四,生态文学是一种构建美的文学。

至于“生态文学”与“自然文学”和“环境文学”有什么异同,当然,异同是存在的。在一定意义上说,无论是“生态文学”也好,还是“自然文学”和“环境文学”也罢,它们的指向是同一个东西。因此,我就不用过多阐述这种“越说越乱”的学术问题了。可我要说的是,“生态文学”在人类社会早期文字里是不存在的,它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,随着生态恶化、生态问题的出现而催生出来的文学现象。

刘华杰:“自然文学”是个年轻词汇,但相关写作却历史悠久。广义地理解,大量民歌和博物学作品都有自然文学的特征,把它们视为自然文学也有一定道理。毕竟,科学通史也是按此逻辑建构出来的。我编的《自然写作读本·B卷》中收录的作者包含普希金、爱默生、普里什文、潘岳、苏童、单之蔷等,甚至包含恩格斯、华莱士·庞廷、卡普拉、马古利斯等。所以,我觉得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界定方面,宽泛一点较好,不要苛求细分,也可减少独断。

在以自然和生态为主要创作对象和书写内容的文学作品中,存在着“人的文学”即“人类中心主义”,与“自然的文学”即“自然中心主义”,这两种创作理念的博弈。您如何看待这种创作立场的区隔?

刘华杰:文学通常是写人事的,“智人”物种内部的恩怨怨是文学创作的核心,于是某种“人类中心论”似乎不可避免。但是,“智人”物种并非只生活在虚空和比特空间里,人的故事总要牵涉大地、山河、空气与其他物种,只写人是不可能的。自然文学中自然物、生态占有的比例肯定要大些,相应地在理念上可表述为一定意义上的“非人类中心论”。“非人类中心论”易误解,但是若干时间过去,回头看它依然是比较合适的修辞。避免误解的关键点在于,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都是逻辑类型,在具体作品中有多有少,是个“度”的问题,不是“有”和“无”的问题。由人来写作,当然不可能做到完全非人类中心论。但是少一点人类中心论、多一点非人类中心论,是可能且必要的。“见物不见人”曾被视为一种缺陷,同样“见人不见物”也是一种缺陷。

沈念:纠缠于“人类中心”还是“自然中心”,就如同在迷宫中打转。人与自然的亲密度正经历深刻变迁,要求创作者必须拆掉一切“中心主义”的围墙,踏入生命平等的对话场。在这里,任何写作技巧可以习得,但生命个体独有的情感、遭遇、悲欢,是无法复制、无法替代的。理想的生态文学,根植于写作者深切的“在地性”体验。唯有生命体验丰盈、情感深沉饱满,笔下的冲突才有真实的棱角,治愈才有切实的温度,作品才有撼动人心的质感。因此,当我们的笔触探向自然中每一个拥有自身命运与尊严的生命时,我们发出的应是生命共同体的共鸣与和声,而非高高在上的独白。

阿霞:面对生态环境的剧变,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“二元论”,无论是“人类中心主义”还是“自然中心主义”,都难以把握当下的复杂现实与挑战。《草原》今年在“自然写作”栏目开设了一个子栏目“自然生态文学研究”,连续推出多位作家、评论家的理论文章,其中陈福民的《人与自然的互相发明及“中国深度”——生态文学简论》就是一篇有突破性意义的文章。他认为:“生态文学应该坚持一种人与自然互相发明的立场,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霸权姿态,也要警惕把自然单极化、去人化的写作。作为生态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,我们应当具备一种迎接挑战的开放姿态,将关于人与自然、人与、科技与自然等新课题放置于一种全新的时代关系中去观测,将生态文学放置到一个新的文明水平上去思考。”面对生态环境的变化,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,人们对地球和宇宙的探索 and 认识,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超越了“二元论”和“单极化”的观念,无论是“人类中心主义”还是“自然中心主义”,都难以把握当下的复杂现实与迎接未来的挑战。这些理论和思考,不仅梳理和重新思考了自然生态文学的内涵,同时也为自然生态文学写作的路径和未来,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空间。

李青松:不可否认,生态文学越来越对人的言论、行为、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。人类只有放弃或者矫正一些糟糕的行为,不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中心,才有可能逐渐远离生态危机。对作家来说,无论创作什么作品都有自己的立场,生态文学作家的立场要站在自然及生态的角度,来认识和理解问题,而不是仅仅站在人的角度。生态文学作家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理解问题,不能为“消费自然”的所谓的“网红”流量推波助澜,不能面对资本糟蹋自然的“蛮横”而沉默不语。如果从生态的角度和立场来看的话,生态文学作家要为自然说话,为那些不会说话的动物说话。

您认为,在生态文学的创作中,作家对各种生态危机进行深刻的现代反思,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、疏离、对立、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更为重要,还是探讨不同生物之间相对稳定、健康、和谐共生的发展状态才是创作的重心?

沈念:这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,而是生态现实的一体两面,如同硬币的正反。不同时代的作品各有其侧重: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《伐木者,醒来!》等,因应经济狂飙,锋芒直指危机根源;进入21世纪后的《山南水北》等,则在社会节奏放缓后,有了更多凝视和谐共生的可能。生态文学的核心力量,在于其开放的问题意识。它拒绝沦为简单的环境控诉书,而应成为一把锋利的手术刀,剖开社会结构、历史沉积与个体命运在生态变迁中的复杂交织。比如在书写水域、草原、森林,不能只流连于候鸟翩跹、草木摇曳的诗意表象,更要敢于直视生态治理巨轮下,人和其他生命的生存困境与身份迷惘。退捕禁渔、全面禁伐——这些保护性政策背后,是世代“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”者生计的断裂与精神的双重漂泊。这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人类生存权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,而是充满张力与博弈的纠缠共生。文学的伟大,正在于它能捕捉宏大生态叙事与微小个体命运碰撞时产生的裂缝——那裂缝中流淌的,正是最真实、最需被看见的生态现实关怀。唯有保持观察的谦卑与思考的开放,敢于触摸复杂的社会结构之网,文学之镜才能映照出生态困境的细节和万象。

刘华杰:自然文学创作要面对涉及复杂因果网络的生态难题。好生态、坏生态是很难把握的。这与认知关系甚大,但我更愿意用审美来比喻性地解释。美与丑,好像人人都懂,好生态和坏生态(或不生态、反生态)似乎也不成为问题,重要的只是如何褒奖前者、鞭笞后者。其实,这是一种极端简单化的理解。即便是科学家,生态学专家,也未必总能准确识别某一生态系统的状态,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(培养良好的审美,比令



刘华杰: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物学者



阿霞:内蒙古文学杂志社社长、《草原》杂志主编



李青松:生态文学作家



沈念:湖南省作协副主席、《湖南文学》主编

人致富要难;而理解生态,比审美还难)。生态恢复(ecological restoration)为何被错误地翻译为“生态修复”?主体换成作家,问题非常尖锐:一名作家如何识别某一生态系统是好还是坏、合格还是不合格?在此,我并非主张唯科学主义,强调只有依据科学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。今日科学家、生态学家有更多话语权,但生态问题的发现、识别、表达,以及生态问题的解决,绝对不只是科学界的事情,也并非只有科学家才能做出实质贡献。自然文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特殊作用,对此作家要有自信心,理直气壮些。这里,“科学”不等于正确,只是指标榜为“科学”的事物,它们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。历史上大量破坏生态的行为,是以“科学”的名义进行的;现在和将来也不会例外。这是“现代性”决定的,“科学”与“现代性”捆绑在一起,在现代社会“科学”扮演合理性、合法性的社会角色。于是,作为科学界之外的自然文学书写,其结论可能与当下的科学结论有些不一致(有些是相反的),而这恰恰体现了张力、价值。如果完全一致,有科学就够了,还用作家做什么?

李青松:生态文学不是哲学,本质上还是一种情感的表达。在生态文学创作中,作家对各种生态危机进行深刻的现代反思,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、疏离、对立、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固然重要,但这不是生态文学的主要功能。生态文学无须用那些“热词”“大词”“套话”“虚话”“空话”来诠释“正确的主题”。生态文学无须搬出“地球”“人类”“宇宙”“未来”等没有边际的缥缈词汇,来演绎宏大叙事。在我们这个时代,破坏自然意味着什么,保护自然有多重要的道理人人都明白。问题是需要行动,需要改变。行动需要从每个人开始,改变需要从每个人开始。我们应该俯下身去,低下头,静下心,认真注视脚下的土地——因为脚下土地发生的事情就是地球的事情——哪怕是一片叶子、一枚羽毛、一声虫鸣、一朵花、一滴水、一粒米。生态文学要回到人间,回到低处,回到我们,回到“我”,回到“我的经历”、“我的感觉”和“我的认识”来探讨不同生物之间相对稳定、健康、和谐共生的发展状态,以及人与自然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。如此,可能才是生态文学创作的重心。

我不太主张生态文学肆意虚构,事实上现实比虚构更精彩,也许写好“我与自然”的故事对生态文明建设更有意义。生态文学不是反科学,不是回归原始,不是拒绝现代文明,而是提醒我们思考“人何以为人”,以及人该怎样对待自然,该怎样对待生命。

您认为,生态文学对于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工作有什么作用?生态文学作家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?

阿霞:政策部署标志着生态文学从自发创作迈向国家战略层面。生态文学是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以文学独特的感染力和传播力,将生态理念传递给广大读者,激发人们对自然的保护意识。从而让生态观念深入人心,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。同时,生态文学为生态文化提供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资源。

它记录了人类与自然相处的历史与经验,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生态文化特色,促进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。

生态文学作家首先要具备扎实的生态科学知识,强化科学叙事能力。深入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、生态危机的本质,才能在创作中准确把握问题,避免陷入主观臆断和表面化描写。还要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,关注现实生态问题,揭露破坏生态的行为,为自然发声,为生态正义呐喊。再者,在艺术创作上不断创新,提高作品的文学品质。运用多样化的文学体裁和表现手法,将生态主题与文学审美完美融合,使作品既有思想深度,又具艺术魅力,吸引更多读者关注生态文学,参与到生态文化建设中来。

中国生态文学已展现出独特路径,既非西方生态批判的简单复制,亦非传统田园牧歌的当代翻版,而是在生态文明视野下,构建一种融合科学理性、地方智慧与生命诗学的中国叙事,为人类寻找一条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”的理想坦途。

李青松:克服现代化的轻率 and 功利,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们民族文化中,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每个人的内心。或许,生态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就在这里。虽然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,而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,甚至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则是完全可能的。这就要求,生态文学必须回到本源去,要进入人的内心。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,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,我们对于发展的巅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审视和思考,是生态文学万万不能忽略的。

刘华杰:回答生态文学作家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这个问题,首先要思考作家的自信从何来这个问题。文学创作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,作家必须在观察、分类、因果追踪上下笨功夫。生态文学作家需要努力的几个方面包括:一是完整理解和体验生态概念,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智识;二是对某地区生态状况的感知、解读决非简单之事,需要持续跟踪调查,涉及所在地物种难题。对当地的动物、植物、菌物没有基本了解,分不清本土种和外来种,写出的作品就不靠谱;三是要有忧患意识和足够强的生态批评色彩,不能总是抒情、唱赞歌。

沈念:时代从未像今天这样,将“生态”二字看得如此重要,这意味着生态文学的舞台前所未有的广阔,内涵也日益丰盈。对作家而言,最大的陷阱莫过于让创作沦为某种单一生态理念的苍白图解,抽干了现实的鲜活与复杂。作家的努力方向,是要以探索者的赤诚,敏锐捕捉时代脉动、政策转向在生态场域激起的涟漪,避开简单化的“人VS自然”二元叙事陷阱,深刻书写转型期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撕裂、迷茫与希望。真正的生态书写,是不预设立场,不强求答案,让问题在真实的叙述中自然浮现,让答案在现实的激荡中逐渐沉淀。因为生态难题无从简易解答方式,生态现实本身就是巨大的矛盾复合体。生态文学的价值,恰在于它敢于拥抱这种复杂,容纳这些矛盾,像江河湖海一样,让无数生命的溪流在此交汇、激荡、沉淀、澄清。最终,在这思想的深流里,寻找人类与万物真正和谐共生的无限可能。这才是生态文学对生态文化建设的根本贡献——提供深度思考的土壤,点燃共情与行动的星火。